

汉译经典

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
ECONOMY AND TAXATION

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

〔英国〕大卫·李嘉图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

 译林出版社

汉译经典

〔英国〕大卫·李嘉图 著
郭大力 王亚南 译

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/ (英) 李嘉图 (Ricardo, D.) 著;
郭大力, 王亚南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10

(汉译经典)

书名原文: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
ISBN 978-7-5447-4979-4

I. ①政… II. ①李… ②郭… ③王… III. ①古典资产阶级
政治经济学 IV. ①F09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5773号

书 名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
作 者 [英国] 大卫·李嘉图
译 者 郭大力 王亚南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何 婷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206千字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979-4
定 价 40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 序

一 李嘉图眼前的经济问题

我喜欢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，并非因为他书中的文字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的美，他这一本大著，文字是晦涩的；亦非因为他这书的编次，具有一种于读者便利的系统，他这一本名著，只是三十二篇乱七八糟的论文集。他这书的伟大，在于他真切表现了当时的经济问题。

在亚当·斯密时代，工业革命尚未完全发展。对于制造家的工业，企业家的商业，社会上尚有各种束缚。在上等阶级方面，尚有禁止谷物输入，而为贵族地主谋利益的谷物条例；在下等阶级方面，尚有限制工人自由，以防范相互竞争的基尔特组织。这时候，在资本家方面，尚没有企业的投资的自由；而在劳动者方面，亦没有劳动的择业的自由。

所以，在亚当·斯密时代，唯一的经济问题，是摧毁这种种束缚，让社会上的大工业发展。在亚当·斯密看来，这种种束缚的破除，不仅可能，而且必要。他以为，如果破除了这种种束缚，如果确立了资本家的企业投资自由，确立了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择业自由，则大工业的发展，是指顾问事。

亚当·斯密这种革命思想的重要，不减于卢梭的民约论。卢梭想在政治方面确立第三阶级的自由，亚当·斯密想在经济方面，

确立第三阶级的自由，他们的口号，同是一个自由。

他们二人，还有一个相似之点，卢梭以为，在政治方面打倒专制暴力贵族权威之后，确立第三阶级的自由，便是确立全国民的自由。亚当·斯密亦以为，在经济方面破除种种束缚之后，第三阶级的利益，便是全国民的利益。

贯通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全书的中心思想，便是这种假设。所以他全书讨论的，只是如何发展大工业，如何确立第三阶级自由的问题，但他全书的题名，却是《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》。他以为，资本家为自身利益，把资本投在于己最有益的事业上，亦即最有益于社会。

在亚当·斯密心中，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斗争的黑影，全不存在。后来阶级斗争的惨状，他不曾梦想。在他整个的思想中，只有如何始可发展工业的问题，但工业发展之后，社会上究将受何种影响，在他，实在难于想象。在其《国富论》中，如果偶尔言及了工业发展以后的结果，那他的结论，便是：工业发展于全社会有利。他不知道，随生产问题而起的分配问题，会成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的中心问题。他只注意了经济上的生产问题，未曾注意经济上的分配问题。

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工业发展的结果，决不如亚当·斯密所想象。工业发展，对于劳动阶级及资本阶级，可以而且一定会发生极端相反的影响。于资本阶级有利的，一定于劳动阶级有害。所以，在特殊情状下，工业发展不是国民之富的原因，只是特殊阶级之富的原因。

由工业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上各种惨状，终随时代之推进而暴露。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兴起，乃为必要。圣西门，佛立埃，奥文辈的学说，遂大行于世。但在他们之前，还有一个思想家不可为我们所忽视的，是英国的威廉·高德文。

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的公表，是一七七六年间事，瓦特蒸汽机在工业上的实际应用，则始自一七八五年。亚当·斯密去世，是一七九〇年间事，高德文《政治正义论》的著作，即始于亚当·斯密死后之翌年。以空想共产主义资格而流行于劳动阶级间的这部名著，对于罪恶穷困，则断定其可灭绝，对于富裕阶级的游惰，则直间其非正义。在这部书中，流出了对劳动阶级同情的呼声，对于当时工业发展工厂发达的社会状况，加上了极严正的批评。

这部书的公表，暴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不安。亚当·斯密所未曾眼见或未曾提及的阶级斗争，至是渐就发生，而有日甚一日的趋势。分配问题的黑影，第一次印在人类脑中，而这一次印象的表现，不幸却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呼声。就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立场说，这可说是恶作剧了。

但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，决不能因这种反抗呼声而稍示退缩。为促进这个过渡时期的必要故，拥护资本主义的理論的出现，无论如何，亦不能避免。马尔萨斯起来了，马尔萨斯在第一版《人口论》中，便根据一种所谓自然法则，把高德文的理论驳倒。赖他这本不满三百页的著作的出现，反资本主义的满天风云，才慢慢收敛起来。他肯定社会贫困的必要，认贫困为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，故在人类生活上，绝对不能避免。一切救济贫困提高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的要求，等于违反自然法则的妄言，有害于社会进步。

马尔萨斯这种议论，对于资本主义的贡献，不下于亚当·斯密的自由放任论。但亚当·斯密只看到了一个生产问题，马尔萨斯则因时代较后之故，再在生产问题之外，发现了一个分配问题。他认出了，生产问题的解决，不是分配问题的解决。所以，在第一版《人口论》中，他说：

“亚当·斯密博士研究所揭的对象，是国民之富的性质与原

因。但还有一种研究，也许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种种有影响对国民幸福或社会下层阶级（各国都以这阶级占大多数）幸福的原因。亚当·斯密为屡屡把这二种研究，混而为一。我亦充分承认这两个问题的密切关系，并且，就一般说，增加国富的原因，亦有增进下等人民幸福的趋势。但这二种研究的实际关系，也许不如亚当·斯密博士所说的那样切近，至少，他不会注意一种事实，即，社会财富的增进，并不增进劳动阶级的幸福。”

在《人口论》最后订正版中，他的意见，便更确定了。他改订前言，说：

“亚当·斯密研究所揭示的对象，是国民之富的性质与原因。但还有一种研究，也许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种种有影响于社会下层阶级（各国都以这阶级占大多数）幸福的原因。亚当·斯密屡屡把这二种研究，混而为一。这二问题，无疑有密切关系。但其关系之性质与程度如何，财富增进对于贫民状况之影响又如何，他所叙述的，尚未能十分准确。……仔细考察一下，则知维持劳动的基金，不必随财富增加而增加，若按比例而同时增加之事，则为绝无仅有。”

马尔萨斯对于经济学的贡献，在于他明白认识了分配问题的重要，马尔萨斯对于资本主义的贡献，在于他把社会上的贫困现象，归因于人口的自然法则，而为资本主义解去一层重围，把劳动运动的声势压下。从马尔萨斯的论调，我们知道当时英国的经济问题，不外两个，一为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，一为如何压制社会主义的问题。前者的特色，是企图打破生产上一切可能的束缚，后者是企图把一切可能的束缚，加在劳动者身上。资本主义一方面要求自由，一方面压制自由。

这是一种矛盾，但资本主义就在这种矛盾中发育。当时尚无人能认识这种矛盾的原因，从目的论的立足点说，固可由资本主

义发展自身之内在要求而解释，但从唯物论的立足点说，则当由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之事实而说明。反谷物条例同盟的成立，是一八三八年事，谷物条例的明令废止，是一八四六年事，保护政策的放弃，是一八五二年格莱斯登任财政大臣时所决定。《人口论》第一版公布之时，却为一七九八年，最后订正版的发行，亦不过一八二六年。所以，在马尔萨斯生命尚未完毕之前，资本主义的发展，亦尚未达到相当繁荣的地步。这时，就使没有马尔萨斯，马尔萨斯主义却一定会发生。当时资本主义的状况，必须有马尔萨斯这样的辩护。

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发生，亦应从同一见地解释。他是马尔萨斯的朋友。他的学说，亦是当时实际经济问题的表现。什么是当时的经济问题呢？不嫌重复，可再述一遍，即：资本主义为完成它自身的任务起见，有完成它自身的必要，但完成它自身，则对当时生产上种种束缚，必须实现自由的要求，而对当时劳动运动的种种要求，必须加以不自由的束缚。

二 李嘉图的分配论

资本主义的命运，一方面可使我们悲悼，因为在它尚未从封建束缚完全解放出来以前，即已引起反对自身的劳动阶级的势力，他方面又可使我们安慰，因为在它尚未充分发展之前，每逢困难，都幸有救星。在这许多或大或小的救星之中，李嘉图当然是最大的一个。他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一员虎将。他拥护资本主义的方法，不外两途，即辨明企业自由的正当与劳动阶级要求的非理。前者是他生产论的一部，后者是他分配论的全体。前者承继亚当·斯密一脉相传的自由主义思想，后者却为他所创论，为后世各不同

学派的根据。所以,要知道李嘉图的生产论,不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,亦未尝不可由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推知;但要了解近代各种重要的经济学说,则非研究李嘉图的分配学说不可。

李嘉图自己,亦觉得他的分配论,在他全部学说中,是最重要最创造的一部分。所以在《经济学》第一版序文中,他说:

“劳动,机械,资本联合使用在土地上面,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,分归社会上三个阶级,即地主,资本家,与劳动者。地主有土地,资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资本,劳动者则以劳力耕作土地。

“全土地生产物在地租利润工资的名义下,分归各阶级。……

“这种分配,受支配于一定法则,确定这种法则,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。杜哥特、斯托亚特、斯密、萨伊、西斯曼底等人之著作,固会改进这种科学,但关于地租利润工资的自然程序,犹未能有令人满意的主张。”

在他的分配论中,他认为最重要的,是地租学说。所以他在同一序文中,说:“亚当·斯密和上述数名家,因不曾了解正确的地租原理,所以在我看,都忽视了许多重要的真理。在地租问题尚未看透以前,要发现这种真理,殆不可能。”这种说话,对于今日研究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人,犹甚重要。

李嘉图这里所说的“许多重要的真理”,即他“关于利润法则工资法则和赋税作用的意见”。所以要了解李嘉图学说,须先述他的地租论。

在《经济学》一书中,《地租论》怕是最重要的一章了。读此书的,当然不可轻易放过。为求简明起见,略述如下。

李嘉图以为,地租“是因使用原有且不可灭的土壤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生产物”,不可与资本的利息利润混同。地租的发生,不是耕作品质较良的土地的结果,反之,正是因人口增加而不得不耕种劣质土地的结果。原始社会,地广人稀,只耕

最优良的土地，故无地租。后因人口增加，最优良的土地有限，遂不得不耕作劣质或地位较不适宜的土地。此时，最优良的土地，始有地租，而地租额之多少，则由这二种土地品质之差而定。人口愈增殖，人类必须耕作之土地品质愈低劣，优良土地的地租，亦必按比例而愈增加。

他既认地租腾贵是耕作较劣土地的结果，所以他说地租是谷物价格腾贵的结果，不是谷物价格腾贵的原因。地主就使抛弃全部地租，亦不能引起谷物价格的低落。地租不是构成价格的要素，地租非从劳动工资或资本利润中扣出。地租的输纳，决不是劳动者农业家的损失。这种主张，对于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，真是绝妙的辩护辞。

李嘉图的工资学说，亦极可注意。劳动的价格，和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格，同样有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区别。市场价格虽因人口增减或劳动之供求比例变化而变化，但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符合，又是总的发展趋势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说：

“当劳动的市场价格，超过于其自然价格时，劳动者的境况，是繁荣而幸福的，他有力在生活必需品方便品上，支配一个较大的比例，因而可以供养一个健康而较大的家庭，但高工资又是增加人口的奖励，劳动者的人数加多了，工资便将降而至于其自然价格，且有时由于一种反动，而降到自然价格以下。

“劳动市场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，劳动者的境况，便最难堪。这时，习惯上绝对必需的享乐品，亦因贫困而剥夺了。在这种困顿的场合，劳动者的人数减少而劳动的需要增加，劳动的自然价格，继再提高而至于自然价格。劳动者又依自然工资率，得到他们适度的享乐品。”

把劳动阶级的生活状态，抑制在这样一个自然标准上，使他们所领受的工资，只足维持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族，那真无异把

劳动阶级锁在千斤的铁枷上，叫他们永远不能翻身。他把劳动者的劳动视为商品，那又以非人格的待遇，来待遇劳动者了。

再讲他的利润学说。在他的利润论上，他说：“在支付地主与劳动者以后，土地生产物的其余部分，必须属于农业家，做为资本的利润。”又说：“农业家制造家的生存，端赖利润，有如劳动者的生存，端赖工资。利润的减少，必致减少蓄积的动机，如果利润之少，尚不足补偿他必致遇着的困难与危险，他就全然不会蓄积了。”由这种话，他又确认资本利润的正当了。

李嘉图的分配论，有一最大特色，即肯定地租与利润的正当，而斥劳动阶级要求的非分。劳动的市场价格，虽暂时间可高可低，但究局之趋势，却为一致于其自然价格。劳动者要求自然价格以上的工资，实属非分的要求。安分守己的劳动者，应满足于自身生命与种族的维持，不应希望增进自身的幸福。增进劳动者幸福的希望，只是希望，社会主义的实现，只是幻想。

李嘉图这种学说，虽不像马尔萨斯那样肯定贫困的必要，但至少否定了劳动者生活改良的可能。马尔萨斯的学说，固甚残忍，李嘉图的学说，亦未免冷酷。他们都想靠一种自然法则，来压制劳动者的生活。经济思想史家，常常把他们列为悲观派，或是因为这样吧。但我们不可忘记，他们所描写的劳动阶级生活状况，正是工业发展后的真实情形。

李嘉图的分配学说，还有点令我们注意的，是他视地主资本家劳动者三阶级的利害关系，极端相反。

他以为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，都有一种不付地租的现耕地。这种土地，在现耕各种土地中，是最不生产的，它所能提供的收获，只足赔偿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。较肥沃的土地，虽能提供较多量的收获，但赔偿利润与工资之外，有余便须扫数付给地主。谷物价格，即按这种量不生产不付地租的土地所产谷物

之价格而定。换言之，这种谷物的价格，是各种土地所产谷物价格的标准。故谷物价格的高低，无关于地租。

由这个前提，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：（一）地租的多寡，定于生产的难易，生产愈困难，地租愈提高；（二）地租无论多寡，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的合计，在一定生产条件之下，决不可变。以第一结论为前提，断定了地主阶级与社会上其余各阶级的利害冲突；以第二结论为前提，又断定了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利害冲突。

地主阶级因要地租增加，当然希望生产的困难加甚。谷物条例之禁止谷物输入，就是这种利害关系的说明。但社会上其余各阶级，却希望生产之困难减少。消费者当然希望商品的价格低廉，但要使商品价格低廉，又非使生产便利不可。资本家则以消费者与雇佣者二重资格，希望生产的便利增进，因工资的腾落，亦定于劳动者必需品价格的腾落。地主阶级与社会上其余各阶级的冲突，恰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。

如果在一定生产条件之下，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的合计额，决不可变，则工资多寡，显然与利润多寡之趋势相反。工资提高，必致减低利润，利润提高，必致减低工资。这种议论，在李嘉图经济学中，常可发现。按照他的论法，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利害关系，自始即互相冲突。这种议论，亦是当时实在情形的反映。

现今中国人，往往误认马克思为提倡阶级斗争的宣教师，反对马克思的，有这种误解，赞成或信仰马克思的，亦有这种误解。如果马克思的学说可以说是提倡阶级斗争的，则李嘉图当推为宣传阶级斗争的领班生了。

马克思学说是当时社会现象的表露，李嘉图学说亦然。

三 李嘉图学说的影响

读李嘉图《经济学》，有一事最令我们纳罕。他书中，一句一字，都为资本主义辩护，但他书中一字一句，又都可转用作反资本主义的武器。这种现象，在别个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上，绝对没有。李嘉图《经济学》之所以有价值，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原因吧，但李嘉图《经济学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，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。

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，在他的《经济学》中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。他的劳动价值说，可以说全部由亚当·斯密得来，后来由马克思承继下去，这在经济学史上，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极有趣的经济学说进化的痕迹。由此，我们看出了，亚当·斯密李嘉图辈用以辩护资本主义的主张，转过来，可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武器。亚当·斯密李嘉图明明承认了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，却又承认所创造的价值一部分，应在地租名义下归于地主，一部分应在利润名义下归于资本家，而剩给劳动者的部分，反只足维持劳动者最必要的生活。马克思同他们一样，说一切价值的来源是劳动，但他却说，在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下，即在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价值中，扣去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要的部分以后，剩余价值即须归于社会上的游惰阶级如地主与资本家。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学说，我们如果舍弃他们中心的伦理观不论，便可说这两种学说，殆无不同之点。如果有，那只是研究态度的不同。前者是说明的，后者是批评的；前者眼中的资本制度是永劫不移的经济组织，后者却认资本制度为人类社会进化所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。

在所谓正统经济学派的著作中，流行一种极重要的观念。在

李嘉图《经济学》中，这种观念，尤为明显。世人因不明了这个观念，往往不能彻底了解李嘉图的经济学说，那就是经济人的假设。在正统派经济学者心中，似乎有一个抽象的社会存在。在这个社会中，人类只有一种活动，即谋利的活动，人类只有一种要求，即生计的要求，人类只有一个目的，即变成富裕的人。总之，这个社会内的人，是纯粹的经济人。他们被假定为没有道德，没有真理，没有艺术。他们的理想，不是善，不是真，不是美，只是富。由这种经济人的假定，我们又联想起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，即有时被称为经济史观的那种学说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，承认一切思想的艺术的道德的活动为“上层建筑”，而受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条件与生产组织，因为这才是基础。李嘉图与马克思，在这里，又极相类。但前者所以有经济人的假设，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方便，后者经济史观的命题，却是断定资本主义没落的前提。

李嘉图的工资法则，我们前面讲过，确实是最冷酷的一个结论，但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真确的一个结论。这结论，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拉塞尔称为工资铁则，认为难于打破，但其打破，又被认为社会主义者应有之目标。马克思亦承认这个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真确。在他的《资本论》中，他常提及这个理论。他的剩余价值学说，亦未始不以此为根据。但李嘉图的工资铁则，是钳制劳动者的铁枷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，却是解放劳动者的福音。

马克思最有名的阶级斗争说，早已在潜隐状态上，表现在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中了。李嘉图视地租利润工资为对立之物，已充分表示了这三阶级利害关系的冲突。

讲到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关系，使我们想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。在李嘉图学说中，已包含马克思学说的种子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，亦包含社会主义的胚胎。在母亲的怀中，已经怀了儿子。

这种奇迹，李嘉图似已预先知道了。在《经济学》的序文中，他说：“……他（李嘉图自己）现今要发表他关于利润法则工资法则和赋税作用的意见，总不致被目为僭妄罢。倘著者认为正确的原则果然正确，则进而探索其重要的归宿，任务当属于他人。才能浅薄的本书著者，不能胜此重任。”

“才能浅薄”是自谦的，“不能胜此重任”，只因时代早了些，而这里预言的“他人”，当然是《资本论》著者马克思了。马克思根据他的学说，断定了资本主义的没落。

马克思亦甚推崇李嘉图。他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二版序文中，便推李嘉图为正统经济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，认李嘉图的经济学，为有产阶级经济学之登峰造极。在他别种著作中，亦有类似的称扬。

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个经济学家，却根据于大部分互相类似的前提。这，实在是研究者大可注意之点。

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影响，当然尚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寻得。后来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麦克洛克、西尼耳、约翰穆勒、克恩斯的意见，虽与李嘉图稍有出入，但大部仍以李嘉图学说为根据。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社会主义者奥文、汤蒲孙、浩德斯金；大陆社会主义者蒲鲁东、洛伯达斯，都曾直接间接受其影响。拉塞尔的工资铁则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，就完全根据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。他真是“十九世纪最多影响的经济学者”。

四 李嘉图的生平及其著作

大卫特·李嘉图于一七七二年四月十九日生于伦敦。父名伯拉罕·李嘉图，是生于荷兰的犹太人，后移居伦敦，经营股票交易所，弄得了大财产。经济学家李嘉图，是他第三子，十四岁时，

便跟父亲，从事于交易所的工作。

李嘉图之生，是《国富论》出版前四年的事体。那时，工业革命正在英格兰发动，社会上顿呈紊乱状态。乡村人口缺乏，谷物供给不足等等困难，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他父亲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，但他却爱上了一个非犹太教的女子，名叫威金孙女士的，因此，不得不与父亲分离。他是二十一岁结婚的。结婚的生活颇为圆满。同时，他经营股票交易所的运气亦不坏。三十岁时，家中已颇有积蓄，后来，他还成了大地主。他生活的安定，或是他研究成功的一个原因。

他本来很喜欢研究数学化学地质学及矿物学。一七九九年，他和夫人旅行于巴斯，偶然看见了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便觉得很有趣味。研究的结果，于一八一〇年著了一本《金块高价论》，曾披露于《早邮报》上。这是他第一部著作。

李嘉图曾受几个大学问家的影响。当时的詹姆士·穆勒、马尔萨斯、边沁，都会在精神上给他鼓励，或在思想上给他指导。李嘉图的大著《经济学》的公表，亦为穆勒怂恿的结果。

一八一九年李嘉图被举为下议院议员，虽非属自由党，但常与自由党一致投票。一八二三年，以病重故，辞议员职。数月后，他便作古了。他死于一八二三年九月，享年五十有一。

李嘉图既未受完全的教育，而他专心研究经济学，又不过始自一八〇九年。他的研究期间，实在很短。但他惊人的成绩，表现而为著作的，已有多种，如——

- 一、《金块高价论》 一八一〇年
- 二、《论金融问题答波桑葵君》 一八一一年
- 三、《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》 一八一五年
- 四、《通货之调剂与稳定》 一八一六年
- 五、《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》 一八一七年

六、《基金制度论》，公表于一八二〇年出版大英百科全书附录中。

七、《威斯特恩之金融意见》 一八二一年

八、《农业保护论》 一八二二年

九、《国家银行计划》，李嘉图死后一八二四年出版。

十、《马尔萨斯经济原理之注释》，未单独出版。

其他零星著作，如信札政论，尚未列内。他生平著作的丰富，亦颇可称耀了。

在这些著作中，最重要的，当然是《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》。此书第一版出于一八一七年，第二版出于一八一九年，第三版颇有增订，出现于一八二一年。法译本为萨伊氏之手作，出版于一八一九年，德译本则由斯密特出版于一八二一年。日译本据我所知的，已有二种，一为堀经夫译，一为小泉信三译。

这本名著在经济学上的位置，已有定评，用不着我吹。这部书的特色，是文字晦涩，编次杂乱，议论冷酷，立论抽象，以假设擅长。演绎法的经济学，是恰如其分的称呼。

这个译本，是我和我的朋友王亚南君合译的。第二章至第十五章，由我友亚南担任，余则由我担任。这部大著的介绍，对于中国经济学界，不知能否有些微的贡献，如果有，则功应归于我友亚南，这部书的重要部分，大半出自他的手笔。

这篇译序，本应由我们共同负责发表，但亚南今尚留居日本东京，我却匿居在被称为“匪窟”的故乡，过无聊的粉笔生涯。因交通不便，邮寄亦甚困难。没有办法，只好由我单独负责。

郭大力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